

Number 5

2004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ology

第五期

二〇〇四年

香港社會學學報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香港社會學學會 中文大學出版社

聯合出版



從社會距離看台灣的族群關係

章英華

中央研究院

伊慶春

中央研究院

族群關係為當前台灣重要的社會議題。本文利用2000年11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社會意向調查之資料，以民眾之通婚偏好所呈現的社會距離態度來觀察台灣的族群關係。根據平均數與多變項分析，我們發現台灣三個漢人族群雖有自我偏好的傾向，但各族群在社會距離所顯示的偏好排序極為類似：依序為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至於被認為政治態度有異於其他族群的外省人，與其他兩個漢人族群相比，其實呈現較少的自我偏好，與其他族群之間的社會距離也不是特別大。根據多元尺度分析，台灣各族群與台灣以外地區之人群呈現區隔，意味着各族群在日常生活上的確以台灣為一社會互動的整體地緣單位。就台灣民眾對台灣以外地區各類人群的社會距離感而言，香港人與新加坡華人最小，其次是日本人與美國人，再其次是大陸人。我們推論，這是由華人因素與地區社會經濟地位因素導致，亦即台灣民眾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佳地區的華人之間的社會距離較小，而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差的大陸人以及台灣的原住民之社會距離較大，後者甚至

本文初稿以「從社會距離看族群關係：台灣資料的初探」為題，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社會意向與社會指標調查研討會」（2002年6月）上發表。筆者感謝李文傑先生協助多元尺度分析的統計處理。如有查詢，請聯絡章英華教授或伊慶春教授。地址：台灣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電郵：ethwa@gate.sinica.edu.tw（章英華）；chinyi@gate.sinica.edu.tw（伊慶春）。

超過非華人。我們分析，台灣的國家認同困境固然自1950年代已逐漸浮現，然而，移入台灣較晚的外省人，雖持有較強的中國認同，但畢竟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與十八、十九世紀移入台灣的漢人一樣，有所謂土著化的現象。

國民政府遷台，一方面是將中國的正統帶到台灣，另一方面造成台灣與中國大陸持續的分隔。台灣不論稱號如何，作為政治實體在國際運作的客觀事實，已經持續了近60年。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族群認同、政治認同與文化取向，複雜地糾結在一起。從清朝漢人移民台灣始，到了十九世紀，閩南人與客家人各有其聚集地，兩者的區分一直延續到目前，而客家人則一直處於邊緣地位(施添福 1987)。1949年以後，大量由中國大陸移入台灣的人口，雖來自不同省分，卻形成了有共通性的外省族群。事實上，在台灣社會內部有本省、外省之分，是一個新的分類，而在日據時期與漢人隔離且各自為聚落的「高砂族」，則逐步融入社會而有「原住民」一詞的出現，再加上劣勢的客家人認同的外顯化，形成台灣社會新興的現象(張靜茹 1999; 張茂桂 2003)。換言之，這可說是在日本統治結束且又與中國大陸實質分離之後，台灣各種社會、政治與文化認同因素糾結所產生的結果。

台灣的族群認同和族群關係，當然有其客觀的基礎，但正如有關的研究所顯示(Blalock 1982; Anderson 1991; Bulmer and Solomos 1999; 張茂桂 2003)，這也是透過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才形塑出來的現象。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台灣的社會生活中，族群逐漸走向融合，被認為處於統治地位的外省人，與閩南、客家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逐漸接近，跨族群的通婚比率也日增。但雖然有此趨勢，外省人在教育與職業地位上的優勢繼續，在通婚和交友上也保持某種程度族群間的自我偏好(林忠正、林鶴玲 1993; 王甫昌 1994; 蔡淑鈴 1995; 章英華、黃毅志 1999; 陳端容、陳東升 2001)。族群自我通婚的偏好是否反映族群間的社會距離，不僅是台灣社會的重要問題，也是社會學研究的典型學術議題，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本文以2000年的「台灣社會意向調查」問卷資料，分析通婚偏好所呈現的社會距離態度，提供討論的基礎。

社會距離態度作為反映族群社會融合的指標

社會距離量表原用於測量人們對不同族群的偏好或拒斥態度，其範圍後來雖然擴及其他團體或組織，但主要仍用以觀察種族與族群態度，而且是觀察一個社會中族群關係變遷的最簡單指標之一 (Bogardus 1925; Payne et al. 1974; Smith and Dempsey 1983; Verkuyten and Kinket 2000)。在探討族群關係時，就實際的行為，我們固然可以用族群通婚與交友等社會關係來分析，但是因為族群人數不同，往往會影響到有關行為的機會。譬如人口佔多數的族群與其他族群通婚或交友的機會，就很可能低於人數少的族群，因此純以通婚或交友的比率大小，不能推論某一個族群與其他族群交往意願的高低 (章英華、黃毅志 1999; 吳乃德 2002)。尤其對於一些人數特別少的族群，在一般問卷調查中可以取得的受訪者數目更少，以致難於由此推論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交往關係。

因此，社會距離量表的功能之一，便是觀察其他族群對這些少數族群接納或排斥的一般態度。當然，社會距離量表作為態度的測量，不見得就能反映或完全預測實際行為——例如願意或不排斥與某一族群結成姻親的受訪者，未必在現實中會與該族群通婚。然而使用社會距離量表可以避免受制於族群人口的多寡，直接就各族群樣本願意與其他族群共事、交友或通婚等的比率，說明各族群間相互接受的程度。因此，社會距離量表的優點，即在有利於使用長期的資料來推論族群關係變化的趨勢。

由於特殊的歷史因素，在台灣漢人之中，形成了在日常生活裏可以指涉不同的族群類別，特別在有關國家或民族認同方面，族群更成為重要的社會變項。於是在政治層面，族群間統一與獨立態度上的區分，近年已成為熱門的課題 (張茂桂 2003)。除了國家認同的議題之外，社會科學研究者比較關注社會層面的族群融合課題，並陸續出現一些討論族群間通婚、交友情形與變遷的論文 (王甫昌 1994; 蔡淑鈴 1995; 章英華、黃毅志 1999; 陳端容、陳東升 2001)。但利用社會距離量表來討論族群關係，似乎仍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台灣學

術界以社會距離量表測量族群關係的研究仍極其有限，筆者們所知已發表的兩篇論文，都侷限在探討大學生對外國人的態度與趨勢 (Yang, Lee, and Yu 1963; 席汝楫 1989)。因此，最近的社會意向與其他調查採用社會距離量表，可說是嶄新的學術嘗試。然而，因應電話調查的特性，僅容許我們採取社會距離量表中的關係類型之一進行施測。

回顧Bogardus最先設計的社會距離量表，大多用於自填問卷，要求受訪者針對問卷中所列出的不同族群或不同民族，就是否願意與之結為姻親、成為同一俱樂部中的密友、成為鄰居、成為同業的同仁、成為本國的公民、只願他們來本國訪問、不願他們進入本國等不同面向，表示主觀的看法。愈是前面的關係，被視為愈是親密，也代表或反映與受訪者較小的社會距離。如此的題目排序可以形成格特曼尺度 (Guttman scale)，而複製係數 (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 都達到 .90 以上，意味選擇前一種關係的，應該會選擇其後的各種關係。例如願意結為姻親，自然應該也願意成為密友、鄰居、同行、同國公民等。在2000年的社會意向調查中，考慮到電話訪問的時間因素，我們決定選取一種最密切的關係——即「結為姻親」——作為代表性指標 (Bogardus 1925; Miller 1983:329-38)，以觀察台灣居民對不同族群或外地居民的社會距離態度。

樣本與量表

本文分析所採用的乃2000年11月進行的全台灣戶中抽樣的電話訪問資料，共完成1,222個樣本 (伊慶春、傅仰止 2000)。樣本中父母或母為原住民的只有16位。因為下文的討論主要以族群為基礎，原住民數量太少，不足以成為獨立分析的類別，因此在分析中刪除了原住民樣本，實際可用樣本為1,206個。

針對台灣的特殊社會脈絡，我們將測量社會距離的對象——亦即人群的分類方式，作了較細緻的劃分。測量的對象包括台灣的四個族群 (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三個台灣以外地區的華人 (大

陸人、香港人與新加坡華人)，以及兩個對台灣影響最重要的外國人（日本人與美國人）。這樣的問卷建構，主要目的在藉着相對於台灣以外地區華人及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外國人，來突顯台灣各族群之間的關係。雖然社會距離測量可能有跨文化的差異(Weinfurt and Moghaddam 2001)，我們基本上接受原初格特曼尺度的意含，於社會關係類型只採取成為姻親來詢問受訪者願意將女兒婚配給特定族群的意願(即「若您有女兒要和**人結婚，您心裏願不願意？」)，這是試圖以最極端的社會距離態度面向來反映受訪者的主觀評估。對於台灣以外地區的華人以及日本人與美國人，我們加上「而且結婚後還是居住在台灣」的條件，以控制可以產生其他混淆的情境，例如捨不得女兒結婚後離開太遠的因素。

各題採用的是黎克特尺度(Likert scale)，答項為「非常願意」、「願意」、「還算願意」、「不願意」、「非常不願意」，以及「不知道」。在計算分數時，我們將「不知道」併入「不願意」，因為在這樣的態度問題中，回答「不知道」的應不屬於正面回應，但也絕對不屬於極端的負面，因而將之歸入「不願意」的一類。據此，分析中由「非常願意」到「非常不願意」，依序給予5、4、3、2、1分。分數愈高，意味着在結婚選擇上得到的偏好愈高，亦即對某一類人感覺到的社會距離感愈小，願意互動的意願(或社會交往態度)愈強。

在以下的兩節，我們先就台灣整體樣本以及閩南、客家與外省三類次樣本所反映的對台灣各族群或外地人的社會距離，進行一般性的探討，再就影響社會距離態度的可能因素進行初步分析。

台灣族群的社會距離態度

有關台灣居民國家認同的研究已相當清晰地指出外省人與其他族群間的差異。在統一和獨立的態度上，閩南人與客家人較接近，偏向獨立的態度較強，而外省人偏向統一的態度較強(吳乃德 2002)。再就對族群間政治差異的認知而言，台灣民眾普遍認為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差異最大，閩南人與外省人其次，原住民與漢人再其次，閩南人與客

家人的差異最小。至於對族群間文化差異的認知，人們的一般判斷是閩南人與客家人的差異最小，本省(含閩南、客家)人與外省人的差異其次，原住民與其他族群的差異最大(王甫昌 2002)。

有關台灣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通婚與交友網絡的研究同樣發現，不同族群對本族群交友或通婚有較強的偏好，不過，此等研究也清楚指出族群之間界限減弱的趨勢(王甫昌 1994; 蔡淑鈴 1995; 章英華、黃毅志 1999; 陳端容、陳東升 2001)。由於閩南樣本大，而客家與外省樣本都小，在界限減弱的趨勢下，並不容易推斷族群相互間關係的強弱與變化。

由於原住民被視為與漢人有最大的文化差異，加上他們在社會經濟方面處於劣勢，我們推論，原住民與其他三個族群都有着較大的社會距離。再者，在三個漢人族群之間，閩南人與客家人在政治與文化差異上都認為差異較小，而他們與外省人的差異較大，因此外省人與閩南人、客家人之間的差距會大於閩南人與客家人之間。但很有趣，一項有關通婚態度的研究卻指出，閩南人與外省人的距離要比與客家人來得小，因而推論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政治歧異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社會交往(吳乃德 2002)。藉着台灣三個族群對本地族群、外地華人，以及美、日兩國人的社會距離態度，或許可以提供一些進一步推敲的線索。

根據表1，以整體樣本的通婚偏好而言，在本地族群之中，以對閩南人的偏好最高，外省人其次，客家人再次，原住民最低。閩南人被接受的程度最高，並非是本身人數多和閩南人偏好閩南人所造成的結果，因為客家人對閩南人的社會交往態度要強過對外省人，而外省人對閩南人的交往態度也同樣強過對客家人。另外，在有關原住民的專案電話調查中，受訪的原住民對閩南人的偏好，要高過對外省人與客家人(伊慶春、傅仰止 2000:79)。每個族群都是以對本族群的偏好最高，但其次的選擇都是閩南人。因此，閩南人在婚姻上有明確的優勢。更值得注意的是，閩南人自我偏好以及與其他族群偏好之間的差距，都大過其他族群自我偏好以及與閩南人之間的差距。美國白人與其他族群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Hraba, Radloff, and Gray-Ray 1999)。

表1. 台灣各族群的通婚偏好：平均數與標準差

婚姻對象	整體樣本		閩南樣本		客家樣本		外省樣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閩南人	4.17 (1)	.70	4.21 (1)	.68	4.04 (2)	.81	4.08 (1)	.53
客家人	3.66 (3)	1.00	3.59 (3)	1.02	4.11 (1)	.81	3.76 (3)	.81
外省人	3.90 (2)	.85	3.87 (2)	.86	3.85 (3)	.93	4.07 (2)	.53
原住民	3.21 (6)	1.17	3.19 (6)	1.18	3.11 (7)	1.23	3.37 (6)	1.01
大陸人	2.99 (9)	1.16	2.92 (9)	1.16	3.13 (9)	1.23	3.30 (8)	1.07
香港人	3.40 (5)	1.04	3.31 (4)	1.04	3.31 (4)	1.06	3.49 (5)	.91
新加坡華人	3.43 (4)	1.02	3.42 (5)	1.02	3.30 (5)	1.09	3.58 (4)	.81
日本人	3.13 (7)	1.12	3.12 (7)	1.10	3.15 (6)	1.19	3.14 (9)	1.14
美國人	3.12 (8)	1.13	3.09 (8)	1.14	3.10 (8)	1.20	3.32 (7)	1.01
樣本數	1200 [1199]		917		115		168 [167]	

註：()內為通婚偏好的排序；[]內為婚姻對象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的樣本數。

換言之，具優勢的閩南人對其他族群開放的態度，不如其他族群對閩南人的開放。

至於外省人，不只是閩南人在婚姻對象上對其偏好的程度高過客家人，原住民的選擇亦復如此(伊慶春、傅仰止 2000:79)。因此，外省人相較於客家人的優勢，也是相當清楚的。客家人在整體樣本的通婚偏好位居第三，原住民受到偏好的程度最低，也無庸置疑。比較特別的是在各族群的樣本中，原住民與其他各族群之間的差距，遠大於其他族群之間者。譬如在閩南樣本中，原住民社會距離分數與閩南人所獲得分數之間的差距(1.02)，遠超過其他族群與閩南人之間者(客家人.62，外省人.34)。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體樣本和各族群樣本中，原住民所得到的分數還不如香港人與新加坡華人。

就台灣民眾對台灣以外地區華人的社會距離態度而言，香港人和新加坡華人大致上處於相同位置，平均得分十分接近。以整體樣本而言，大陸人所受到的評估則顯現較大的差距，遠不如香港人和新加坡華人的得分，甚至還不及日本人和美國人。我們也許以為這是由於閩南與客家樣本做成，外省的樣本可能不同。但調查資料顯示，外省人也幾乎有着類似的偏好模式。在外省樣本中，大陸人的得分，不如香

港人、新加坡華人，也不及台灣的原住民，與美國人相近，只高於日本人。

最後是影響台灣最大的兩個國家的國民，即日本人和美國人，除了外省樣本外，不論是整體、閩南或客家樣本，他們的得分都極其類似。外國人的社會距離得分，不僅小於台灣的不同族群人口，也小於香港人與新加坡華人，只高於大陸人，且兩者相較，日本人得分比美國人略高。不過，在外省樣本中，日本人的得分明顯低於美國，並且落於大陸人之後。

總而言之，從平均數的觀察，閩南人、外省人與客家人為一類，香港人與新加坡華人為一類，原住民在中間，接下來為外國人（日本人與美國人），最後則為大陸人，在台灣民眾認知的通婚偏好度上，以上各群體依次遞減。

接着，我們以多元尺度分析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來呈現因通婚偏好所反映之社會距離的涵意。多元尺度分析試圖將資料的結構以空間形式呈現，讓沒有經過訓練的人，也能夠理解有關情況 (Kruskal and Wish 1978; Young and Hamer 1987)。我們運用SPSS的ALSCAL程序，以歐基理德距離模型 (Euclidean distance model) 進行多元尺度的分析。首先必須考慮以幾個空間向度 (dimensionalities) 展示資料，基本上是根據兩個數值的變化來判斷，即stress值愈小，RSQ值愈大，這表示模型的適合度愈好。但為了選擇合適而且最小的向度，以利於觀察與解釋，並不是選擇stress值最小或RSQ值最大者，最簡單的原則是以相應於不同向度所估計的數值，選擇呈現最大轉折者 (Kruskal and Wish 1978:30-35; Young and Hamer 1987:203-6)。如果以向度數目為橫軸，以stress值為縱軸的話，在快速下降的一點之後，會平緩下來，如曲肘的形狀。本文的通婚偏好資料經過分析之後，從一到三個向度估計的stress值，由 .302遞降至 .089，再到 .032，RSQ值由 .746遞升至 .967，再到 .993。兩種數值從第一到第二向度有着很大的變化，因此我們取兩個向度來呈現此一資料的空間模式。

於是我們以兩個向度為依據，製作了對各族群社會距離態度的分佈圖 (圖1)。對多元尺度空間模式的解釋，最一般的是在空間中尋找適

當的對角斜線，在此線的兩端，可以容易地說明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 (Kruskal and Wish 1978)。在圖1，從中點分出的45度角的兩條斜線，可據以推斷各類族群空間分佈隱含的意義。由西南到東北的斜線，東北端一字排開，由閩南到原住民，是台灣地區的四個族群；另一端是美國人、日本人和大陸人，稍近中點則是香港人和新加坡華人。這兩個相對的群組，正反映着台灣地區與台灣以外地區的區分。由東南往西北的斜線觀察，客家人與香港人、新加坡華人居中，往東南在婚姻對象選擇上優勢逐漸上升，先是外省人，再是閩南人；往西北則是在婚姻對象選擇優勢逐漸遞減，包括美國人、日本人、原住民與大陸人。綜合而言，我們可以劃出兩條平行線，一是由閩南人到原住民，代表台灣地區內婚姻對象選擇依次優勢遞減，一是由香港人和新加坡華人，到美國人與日本人，再到大陸人，代表台灣以外地區婚姻對象選擇的優勢逐漸遞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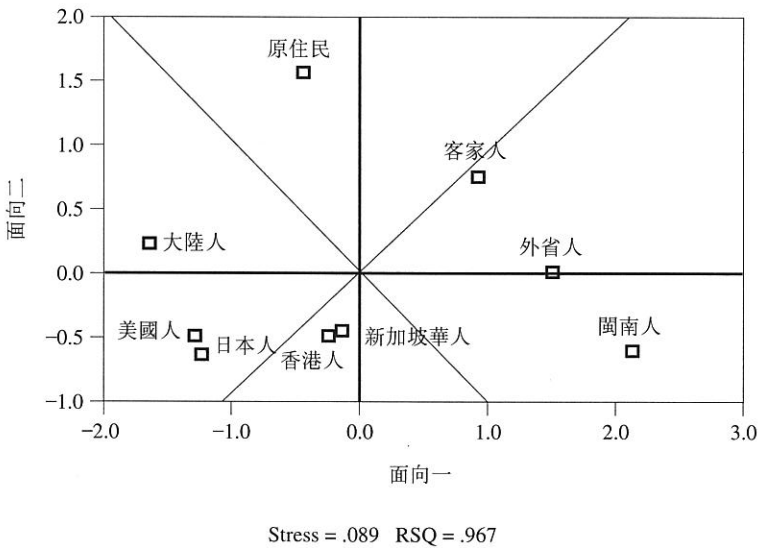


圖1. 社會距離態度多元尺度分析

影響族群社會距離態度的因素

作為初步分析，本文基本上只從族群、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都市化程度等變項的多變項對數迴歸分析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觀察在族群社會距離態度上所產生的變異。在前節的分析中，很明顯的，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相較，在以通婚為指標的社會距離感方面呈現不同的排序，外省人對大陸人和日本人的社會距離態度不同於閩南人和客家人。過去有關對外國人社會距離態度的研究，都指出外省人對日本人的態度有別於本省人 (Yang et al. 1963; 席汝楫 1989)。再者，由於外省人來台灣的歷史尚淺，在中國大陸仍有相當的親友關係，對大陸人的社會距離態度感理應較小。而以婚姻對象選擇作為社會距離態度的指標，男女間的考慮很可能有着極大的差異。有些西方研究強調女性較具同情心，較重視人際關係，對不同族群的寬容性較高，因此呈現出較偏向少數族群的社會距離態度 (Johnson and Marini 1998; Verkuyten and Kinket 2000)。可是在台灣的有關研究強調，由於社會對女性的交友與婚姻一直有較強的規範限制，女性對他族群的偏好反而會低於男性。在婚姻上，女性及其父母都更在乎是否擇偶適當，以得到美滿的家庭生活，因此對與他族群結婚的顧慮會較男性強 (Yang et al. 1963; 席汝楫 1989)。基於台灣的現實情況，我們比較同意後者的看法。但不論預測的方向為何，性別是必須討論或控制的變項。

至於年齡、教育程度與都市化程度這三個變項，在台灣社會快速變遷的過程中，由於社會環境愈來愈開放，使得年紀愈輕者、教育程度愈高者，以及居住地都市化程度愈高者，對於他族群的偏見愈低，也愈願意與他族群交往。年齡較輕者，較缺乏過去族群不良互動的經驗，在社會化過程中接受較多外來文化的影響；教育程度較高者，在教育的過程中，與不同族群接觸的機會較多，同時也較可能接觸外來的文化與外國人，對於接受非傳統意識形態有正面的效果 (伊慶春、高淑貴 1986)；居住地都市化程度愈高者，同樣有着較多與他族群或外國人接觸的機會，容忍度一般較高 (傅仰止、伊慶春 1994)。在以下的

分析中，我們將年齡分成五組（20–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或以上），教育程度分成四類（國小或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大專或以上），都市化程度則分成鄉村、城鎮、都市與核心都會（核心都會包括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市）。

在表2中，五組自變項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並不多，同時模型的解釋力很低。就先就台灣地區內的四個族群而言，對閩南人的婚姻偏好，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明顯低於閩南人自身，而客家人又低於外省人。對客家人的婚姻偏好，客家人有明顯的自我偏好，但閩南人與外省人之間並無差異。至於對外省人與對原住民的婚姻偏好，由於外省與客家變項的迴歸係數都不顯著，意味着三個漢人族群在外省人和原住民的通婚偏好上並無差別。至於對大陸人的婚姻偏好，外省人則明顯強過閩南人與客家人。綜合而言，外省人對島內其他族群從通婚偏好所顯示的社會距離感，似乎比較不明顯，閩南人與客家人都有較強的自我偏好，而客家人對閩南人的社會距離感大過對外省人。

在台灣，男性願意選擇客家人與原住民為姻親的意願較強，這就意味女性的意願較弱。其次，年齡的效果見於對原住民的婚姻偏好，顯示愈年輕的樣本這樣的偏好愈強。第三，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對外省人的偏好愈強，這反映着外省人在都市居住的比率較高，閩南人與客家人居住在都市者，比較有可能與外省人互動。

至於對台灣以外地區華人或外國人的社會距離態度，對大陸人的態度較為特殊，男性以及外省人願意與之結成姻親的意願較強。其他的四類人，都很一致的是年齡達到顯著水準，20–29歲年齡層的婚配意願最強，30–49歲的其次，50歲以上的最弱。大致上也是呈直線關係。此外，則是外省人對美國人的社會距離感較小，國初中程度者對美國人的社會距離感則較大。

根據多變項對數迴歸分析的結果，整體而言，只有性別與年齡變項顯示較明確的影響。在台灣島內，男性願意選擇客家人與原住民為姻親的意願較強，女性的意願較弱。以台灣的現況而言，原住民是明顯的弱勢族群，而客家人一般也被賦予某種刻板印象。就此我們或可推論，女性比較不願嫁入弱勢族群。至於年齡的效果，在對海外華

表2. 族群與社會距離態度的多變項對數迴歸分析

自變項	婚姻對象族群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大陸人	香港人	新加坡華人	日本人	美國人
客家人	-.415*	1.118***	-.027	-.119	.158	-.139	-.262	.046	.038
外省人	-.363*	.221	.324	.292	.637***	.262	.285	.064	.435**
閩南人(對照類別)									
男性	-.195	.469***	.086	.615***	.271*	-.209	-.140	-.078	-.101
20-29歲	.308	.015	.368	.710**	.021	.817***	.893***	.603*	.937***
30-39歲	.432	.165	.528*	.612**	.092	.546*	.611**	.427	.649**
40-49歲	.444*	.135	.417	.490*	.168	.553**	.613**	.432*	.568**
50-59歲	.565*	.008	.138	.136	-.215	.026	.272	.118	.114
60歲或以上(對照類別)									
國小或以下(對照類別)									
國初中	-.123	.197	-.016	-.205	-.360	-.105	.033	-.335	-.564**
高中職	.121	.192	.310	-.363	-.287	-.041	.164	-.130	-.345
大專或以上	-.001	.356*	.352	-.085	-.148	.070	.348	.179	.039
鄉村(對照類別)									
城鎮	.051	.192	.319	.071	.184	.197	.087	-.041	.105
都市	.068	.258	.532*	.209	.376	.376	.419	.351	.474*
核心都會	-.273	.391	.696**	.281	.152	.354	.300	.135	.380
截距一	-6.851***	-2.917***	-3.825***	-1.742***	-1.899***	-2.631***	-2.512***	-2.113***	-1.859***
截距二	-2.887***	-.638*	-1.052***	.108	.024	-.400	-.261	-.115	.126
截距三	-2.223***	-.044	-.479	.692**	.521*	.240	.416	.452	.616**
截距四	1.129***	2.737***	2.621***	3.076***	3.251***	3.110***	3.423***	3.368***	3.591***
樣本數	1,165	1,165	1,165	1,166	1,166	1,166	1,166	1,166	1,166
Log likelihood	-1,057	-1,201	-1,201	-1,615	-1,585	-1,468	-1,427	-1,541	-1,513
Pseudo R ²	.012	.023	.018	.018	.011	.014	.021	.013	.022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人、優勢的外國人以及原住民的的社會距離態度上，都顯示年輕樣本的開放態度，在教育程度的影響並不顯著的狀況下，這反映着世代的效果，在整個大環境的變遷下，年輕世代普遍較能接受外來的事物，因此對與社會經濟條件較佳地區或國家的人民，接納的程度較高。另外則是他們與國內劣勢族群的界線也愈來愈弱。

結 論

過去的研究曾經指出，在台灣，政治態度並不同於社會交往態度(吳乃德 2002)。本文探討社會距離態度，所得發現對之有所呼應，更明確的佐證了台灣民眾在社會交往上的確自成體系。在這體系內的各族群，通婚的我群選擇性固然強，但人數居絕對優勢的閩南人，在台灣社會內的社會交往優勢，明顯的高於其他族群。在婚姻對象上，閩南人不僅顯著的選擇自己族群，閩南人也同時是外省人的最優先選擇和客家人的第二選擇，是最具優勢的婚姻對象。

至於一向被認為在政治立場上異於其他族群的外省人，在作為婚姻對象的社會距離態度上的優勢，只低於閩南人，因為外省人是台灣最大族群——閩南人——在自己族群之外的首要選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多變項對數迴歸分析中，外省人對大陸人的社會距離感的確較小，似乎呼應着外省人一般的政治立場。不過，在外省樣本中，對大陸人在社會距離態度上的排序，不但落於台灣各族群之後，甚至還不及香港人與新加坡華人，也不及美國人。

原住民在台灣各族群的社會距離態度排序上，一致的低於香港人與新加坡華人。但在多元尺度分析中，由原住民與台灣其他三個族群相對於其他地區華人和外國人的分佈狀態，反映台灣內部及以外地區婚姻對象上的區隔，原住民主要是在台灣地區內婚姻對象選擇上的弱勢團體。最值得重視的發現是，族群變項對台灣民眾的社會距離態度之差異沒有顯著影響，因為基本上不同族群的漢人除了對自己族群具較強偏好之外，對台灣地區和其他地區不同族群或民族的婚姻對象排序，可說幾乎相同。

研究結果所顯示的族群婚姻對象排序，或許反映了民族與社會經濟發展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香港、新加坡與台灣同屬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在經濟發展與社會體制上，與台灣相近，因此在社會距離態度上顯示的親近程度，雖然不及台灣島內的漢人，卻明顯高過美國人與日本人，甚至還高過台灣的原住民。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社會體制與台灣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也不如台灣，以致整體而言，台灣民眾對大陸人的社會距離感最大，與日本人和美國人等外國人相比，甚至還更不親近。我們認為如此的社會距離態度不能完全歸諸於統獨的政治爭議，香港調查的結果或可印證此一推論。

在香港同步進行的電話調查顯示，受訪者非常願意和願意女兒與各不同族群人士結婚的比率，依序是新加坡華人(70.4%)、台灣人(67.7%)、美國人(57.5%)、日本人(51.8%)和大陸人(50.5%)。¹ 香港人與台灣外省人因中日戰爭的歷史經驗，有着較強的反日情結，因此使得日本人的社會距離排序與大陸人相近。一般而言，香港樣本對於婚姻對象的整體排序，與台灣極為相似。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但是在以婚姻對象選擇為指標的態度上，明顯與台灣人較為親近。這似乎明白印證了社會體制與經濟發展趨近所造成的結果。另一方面，台灣的原住民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劣勢，導致了台灣地區其他族群對之呈現較不親近的社會距離態度。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對大陸人的社會距離感，由於中國大陸經濟落後，台灣民眾對大陸人有較大的社會距離感。

針對台灣民眾對台灣以外不同華人婚姻對象(亦即香港人、新加坡華人和大陸人)的社會距離態度而言，我們或可推論，在經濟發展優於台灣的歐美地區之華人，台灣民眾可能將其視為與香港人和新加坡華人屬於同一族群類別，社會交往偏好可能會高於歐美人。反之，居住在經濟發展遠不如台灣地區的華人(例如印尼或緬甸)，台灣人對他們的社會距離感，就如對大陸人一般，甚至會低於美、日等外國人。

本文的多變項對數迴歸分析能進一步提供討論的訊息並不多。就性別的差異而言，女性對劣勢族群顯示較弱的交往態度，就如我們所預期的，反映着社會規範對女性交友或婚配的較強限制。年齡的效果

指出，年紀愈輕者，對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相近或較高地區的居民，接納性也較高。由於教育程度和都市化程度都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似乎意味着年輕世代對外來文化接納的程度普遍較高，因此導致他們對這些文化來源地區的人們呈現較親近的感覺。

本研究顯示，就台灣內部的婚姻對象而言，在外省樣本中，對閩南人與對外省人的偏好幾乎相同（對閩南人的偏好還略高，但進一步的t檢定顯示此一差距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客家人則以閩南人為次於自己族群的選擇；但是閩南人是以外省人為第二選擇，接着才是客家人。我們必須指出，外省人移民至台灣的歷史尚淺，在政治上又一直與閩南人有相當大的磨擦。過去一些研究發現，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閩南人與客家人之間的距離感比與外省人之間較為親近（王甫昌 2002；吳乃德 2002），可是本研究發現閩南人在通婚偏好上的社會距離，卻更親近外省人。另一方面，外省人對大陸人作為婚姻對象的選擇偏好，的確高於閩南人和客家人，但是基本上外省人選擇台灣閩南人與客家人的偏好還是更強，甚至對台灣最弱勢的原住民之婚姻偏好也略高於大陸人。換言之，若以婚姻對象的偏好作為社會距離態度的指標，閩南人和外省人之間的親近感，明顯的與其他政治或文化層面迥然不同。而大陸人在所有華人族群類別中，則一致地是台灣各族群的最後選擇。

就此我們或可推論，台灣各族群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確視台灣為一社會互動的整體地緣單位。婚配的基本考慮着眼在台灣之內的社會經濟地位，並明顯受到台灣族群的分佈所限制。而日常生活中，我們也看到老一輩的外省人固然有思鄉之情，然而由於子女都成長於台灣，多年來也習慣於台灣的生活環境，因此展現了對台灣內部族群相對親近的社會距離。這些台灣外省人幾十年下來，已經生根於台灣了；回到大陸，被歸類為台胞，而在台灣，則是被標籤為道道地地的台灣外省人。

總之，依據通婚偏好的分析，台灣不同族群間仍見差異，但界線已經相當模糊。但因着兩岸關係和國際局勢，不可諱言，台灣民眾在國家認同上仍有着相當的爭議。關於整個台灣目前的政治分化現象，

我們觀察到有某些新的族群身分出現，也逐漸形成了政治權力上的優勢與劣勢關係。遙想十九世紀時，大陸移民在滿清帝國的管治下，在台灣落地生根，以台灣為家鄉，被描述為所謂土著化的現象(李國祁 1978; 陳其南 1984)。1949年以後，在台灣的外省人也展開類似的以台灣為家鄉的土著化過程。誠然，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認同，甚至擬塑造一個新的民族，以強調文化的自主性，則相異於以往的歷史經驗。

章英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華人家庭動態研究計劃召集人。主要研究興趣在都市發展、都市社區與社會心理、家庭結構與家人關係。目前主持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參與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與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等大型調查計劃。

伊慶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兼任教授。研究興趣主要為家庭結構與家人關係，家庭與工作制度的連結、私立大學的轉型與青少年的成長歷程。目前主持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主題計劃，近期專著包括“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amily Values: Teenagers and Their Parents in Taiwan”，“Teen Life in Taiwan” (with Chyi-In Wu)。

註釋

¹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2000年11月進行了相同問卷的電話調查。香港亞太研究所在香港完成了1,044份問卷。由於香港並無類似台灣的族群議題，因此在婚姻偏好的對象，只包含台灣人、新加坡華人、大陸人、日本人與美國人(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00)。

參考文獻

- 王甫昌。1994。〈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43-96。
- 。2002。〈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4:11-74。

- 伊慶春、高淑貴。1986。〈有關已婚婦女就業的性別角色態度〉。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題選刊70，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伊慶春、傅仰止。2000。《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4:75-118。
- 李國祁。1978。〈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中華學報》5 (3) :131-59。
- 林忠正、林鶴玲。1993。〈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載張茂桂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101-60。台北：業強出版社。
- 施添福。1987。《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0。〈社會意向電話調查：香港2000——電話訪問調查初步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內部報告）。
- 席汝楫。1989。〈大學生對九國人民的社會距離態度：趨向分析〉。《東海學報》30:169-90。
- 張茂桂。2003。〈種族與族群關係〉，載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239-79。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 張靜茹。1999。〈一頁滄桑史：客家人在台四百年〉。《光華》28 (4) :23-33。
- 章英華、黃毅志。1999。〈婚配與朋友核心網絡的變遷：1970與1990年代的比較〉。發表於「台灣社會的個人網絡：第三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台北。
- 傅仰止、伊慶春。1994。〈容忍態度的結構肇因：都市背景、遷移經驗、異質聯繫〉。《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 (2) :257-30。
- 陳其南。1984。〈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頁335-66。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陳端容、陳東升。2001。〈跨族群的社會連結：工具理性的行動邏輯與社會結構的辯證〉。《台灣社會學刊》25:1-54。
- 蔡淑鈴。1995。〈台灣之婚姻配對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 (2) :335-71。

Anderson, Benedict R.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 Blalock, Hubert M. 1982.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ogardus, Emory S. 1925. "Measuring Social Distanc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1925(1-2):216-26.
- Bulmer, Martin and John Solomos, eds. 1999.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Toda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 Hraba, Joseph, Timothy Radloff, and Phyllis Gray-Ray. 1999. "A Comparison of Black and White Social Distanc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9(4): 536-39.
- Johnson, Monica Kirkpatrick and Margaret Mooney Marini. 1998. "Bridging the Racial Div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ffect of Gender."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1(3):247-58.
- Kruskal, Joseph B. and Myron Wish. 1978.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Miller, Delbert C. 1983.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 and Social Measurement: A Text and Reference Book for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 Payne, M. Carr, Jr., C. Michael York, and Joen Fagan. 1974. "Changes in Measured Social Distance over Time." *Sociometry* 37(1):131-36.
- Smith, Tom W. and Glenn R. Dempsey. 1983. "The Polls: Ethnic Social Distance and Prejudi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4):584-600.
- Verkuyten, Maykel and Barbara Kinket. 2000. "Social Distances in a Multi Ethnic Society: The Ethnic Hierarchy among Dutch Preadolescen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1):75-85.
- Weinfurt, Kevin P. and Fathali M. Moghaddam. 2001. "Culture and Social Distance: A Case Study of Methodological Caution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1(1):101-10.
- Yang, Kuo-shu, Pen-Hua Lee, and Ching-Fang Yu. 1963. "The Social Distance Attitudes of Chinese Students towards Twenty-five National and Ethnic Groups." *Acta Psychologica Taiwanica* 5:37-51.
- Young, Forest W. and Robert M. Hamer. 1987.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History,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ocial Distance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Ying-hwa Ch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Chin-chun Y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thnic groups has been a salient social issue in Taiwan since the 1950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social distance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by using the ethnic preference for daughter's marital choice as the indicator. Results from the descriptiv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show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ethnic preference in the order of Fukienese, Mainlanders, Hakka and the aborigines shared by all three Han groups in Taiwan. Regarding the preference for own ethnic member, Fukienese and Hakka reveal clear preference patterns while Mainlanders report a weaker preference. Compared to other Han Chinese, although Mainlanders have always been identified as politically different, they are not, however, the least preferred group in marital choice. According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there is an obvious spatial contrast between the preference for various ethnic groups within Taiwan relative to that for Chinese and foreigners in other areas. The finding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Firstly, difference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ethnic preference of mating choice. The greater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Han Taiwanese with Chinese in the Mainland and with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in comparison with shorter distance with foreigner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is factor. Secondly, same Chinese ethnicity also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at shorter distance with Chinese in Hong Kong and in Singapore than with Japanese and American are found in the mating preference. Lastly, although the predica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has emerged since the 1950s, Mainlanders as latecomers in Taiwan and with a stronger Chinese identity have socially rooted in Taiwan. Such a process of indigenization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Fukienese and Hakka in the 18th and the 19th century Taiwan.